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印度与世界文明

下册

〔印〕D.P.辛加爾 著



2

汉译

丛书

印度与世界文明

下册

〔印〕D.P.辛加尔 著

庄万友 等译



商务印书馆

201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印度与世界文明:全两册/(印)D. P. 辛加尔著;庄万友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ISBN 978-7-100-16793-2

I. ①印… II. ①D… ②庄… III. ①文化史—印度 ②世界史—文化史 IV. ①K351.03 ②K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53511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印度与世界文明

(全两册)

〔印〕D. P. 辛加尔 著

庄万友 等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6793-2

2019年1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34 1/4

定价:115.00元

目 录

第一章	佛教的东部发展水平	1
第二章	红色印第安人或者亚美人 ——太平洋波浪中的印度浪花	43
第三章	苏伐刺蒲迷：印度文化的亚洲化	101
第四章	伊斯兰教对印度社会的影响	206
第五章	欧洲发现印度	259
第六章	西方对近代印度的反应	311
第七章	印度对现代欧洲的反应	369
注 释	424
参考文献	441
索 引	500

第一章 佛教的东部发展水平

佛教在中亚和中国一旦站稳脚跟，就必然会传播到诸如朝鲜、日本和蒙古等毗邻地区。这些国家同印度有某些直接联系，虽然佛教在蒙古的部分影响是同西藏接触的结果。尽管佛教渗入朝鲜的准确开端还不清楚，朝鲜像中国一样感受到两股巨大浪潮的影响是无疑的：一股来自北方，起源于中亚并经由魏帝国^①传播到朝鲜和日本；另一股来自南方，起源于印度和东南亚，通过中国南方传向中国北方、朝鲜，可能也传到日本。

佛教传到朝鲜是在4世纪后半期。朝鲜此时分离为三个王国——北方的高句丽（Koguryu）、西南方的百济（Pekche）和东南方的新罗（Silla）。这些国家不断进行战争，它们的疆界变动不定。虽然所有这些国家欢迎佛教，并且朝鲜佛教的命运像朝鲜政治命运一样同中国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这三个地区佛教的历史还是并非完全一样。

佛教是受王室隆重邀请，由中国僧人顺道（即 Sundo）在372年传入高句丽的。他来自邻近于朝鲜北部边境的一个小王国——中国此时分裂为十六国。另一位中国僧人阿道（A Tao）随他之后

^① 魏帝国指中国的北魏王朝。——译者

而来。国王在 375 年修建两座寺院，给他们每人一座。通过一位名叫摩罗难陀的印度或者西藏僧人，佛教在 384 年从南方传入百济。据说，百济国王到京郊来迎接他。其他中国僧人很快随摩罗难陀之后到来。寺院开始出现，佛教成为国教。由于其孤立的地位，新罗是最后接受佛教的王国，在佛教被传入高句丽之后三十多年。根据传说，靠向佛做祈祷治愈了国王女儿疾病的佛教僧人墨胡子，说服了新罗国王从中国请一些僧人。

甚至很有可能，佛教在被传入高句丽之前便由海路传到了百济，因为百济与中国南方有海上联系。这一事实难以证实，因为属于这一时期的佛教艺术在百济遗存下来的寥寥无几，高句丽的情况也是如此。两个王国的艺术品都毁于它们同新罗的王朝战争时期。确切资料的缺乏尤其令人遗憾，因为与日本建立联系并且在 6 世纪中期为佛教教义和艺术传入日本起到发射台作用的正是百济。

668 年，朝鲜统一在新罗王朝的统治之下。新罗王朝统治到 935 年为止。许多朝鲜僧人去中国学习佛教教义，有些甚至去了印度。根据义净的记载，五名朝鲜僧人在 7 世纪期间访问印度。朝鲜僧人慧超^①由海路行至中国福建，然后在大信寺学习梵语和佛教达十年之久，在一名中国僧人伴随下继续前往印度。在去中国学习的人当中，法相宗的圆测（613—683 年）、华严宗的元晓（617—670 年）与义湘（625—702 年）最为著名。元晓是该时期著名的僧人，他奠定了朝鲜佛教的坚实基础，他的著作即使在中国和日本也十分受尊重。不过，他并没有去当时在唐王朝统治下

^① 慧超，一作惠超，幼年来中国，后航海至天竺，遍诸佛迹，于公元 727 年取道陆路还至中国。撰有《往五天竺国传》三卷。——译者

的中国，尽管对学者们而言，去中国学习是风行一时的事。承认一切众生没有区别地具有佛性的华严宗的教义，最早在7世纪后半期传入朝鲜。叟信是积极与唐代中国学术界联系的朝鲜僧人，由于他的努力，瑜伽行派佛教的“唯识”教义在朝鲜传播。朝鲜大量借用中国文明，这种倾向当时有助于佛教的发展，虽然佛教的可怕对手儒学也在8世纪传入。

新罗的首都庆州（Kyongu）是繁荣的佛教文化中心和贸易中心，吸引着印度、西藏和伊朗的商人。随着佛教的发展，庙宇、寺院和印度塔出现了。今天，在庆州附近保存下来的若干遗迹和某些早期新罗艺术，在风格方面明显是印度风格。

在935年取代新罗王朝的下一个王朝高丽（Koryo）虔信佛教。¹因此，佛教艺术和文化得到广泛的表现，11世纪成为佛教在朝鲜最繁荣的时期。可是，这也是一个边境之外的民族不断进逼和入侵的时代。尽管成功抵抗了这些入侵者，一种不安全感还是继续在朝鲜存在，这使得在宗教解脱和慰藉中寻求安慰的需要增加。在这个世纪末，太子成为僧人，去中国学习，他回国便宣传天台宗佛教的教义。在他的创始下，大量佛经被从邻近地区引入，并且在朝鲜刊印。在高丽时期，佛教成为朝鲜宗教生活的全部基础，影响人民的思想意识、风俗习惯和道德，还有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宗教节日由宫廷隆重壮观地加以庆祝，华丽的庙宇被修建。许多佛教僧人甚至在行政部门占据显赫职位。可是，在高丽占支配地位的后半期，佛僧参政开始引起日益增多的反对。

迄那时为止一直是与新罗王朝相联系的作为朝鲜贵族的宗教的佛教，通过如义天这样的一些著名僧人的努力而成为老百姓的

信仰：义天将禅宗（禅定或者禅）介绍到朝鲜，他因编辑汉文三藏的目录而出名。汉文三藏在朝鲜语中叫《大藏》(Taejang)，刊印于1010年。禅宗在朝鲜广泛传播，在12世纪像智纳(Chinsul)所教导的那样变得格外流行。禅宗终于在朝鲜获得优势，虽然喇嘛教在蒙古统治中国期间被传入朝鲜。

高丽王朝1392年衰落之后，佛教一般受到国家压制，只有偶尔的缓解时期。体现中国新儒家的朝鲜李氏(Yi Chosun)王朝(1392—1910年)统治者鼓励儒家学说的复兴。儒家被王室给予如此热情的赞助，以致儒生对其他信仰变得极端不容忍。那些因为佛教强调人类平等而遭受权利和声望损失的封建贵族，站在儒家一边。尽管有国家的压制政策，佛教作为群众的宗教继续繁荣；国家的压制政策，在太宗国王(1401—1418年)的统治下变得严4 厉。僧人处能(Hanho)刊印了谴责这次严厉迫害的著名书籍。下一个国王世宗(Sejong)设法结束了迫害，世宗实际上称自己为佛的捍卫者。他是一个明智、机警的统治者，认识到他所帮助翻译的佛教经典的巨大学术价值。他还被认为是朝鲜字母系统“谚文”(Hangul)的发明者。

15世纪，当朝鲜成为中国的藩属国时，朝鲜佛教的命运更加受佛教在中国的起伏影响。随着日本作为大国的兴起，朝鲜越来越受到日本的控制，并于1910年被日本兼并。日本佛教徒利用变化了的政治环境，加强了他们鼓励朝鲜佛教的活动，并且根据自己的模式重建它。尽管朝鲜佛教保持了自己的特色，它肯定还是由于日本佛教僧人的活动而受益。根据1926年的数据，朝鲜有1363座寺院和7188名佛教僧侣。

佛教在朝鲜仍然深受尊重，尽管有儒家道德观对朝鲜思想和生活的影响，朝鲜仍然是佛教徒们积极参与公共福利活动，特别是教育活动的国家之一。现代朝鲜的佛教，是带有信仰阿弥陀佛和弥勒菩萨色彩的禅宗。虽然朝鲜没有为佛教贡献它自己的流派，在教义方面没有得到显著的发展，还是在中国和日本之间起着文化中介作用，从而将佛教传播到日本。

在佛教来到朝鲜之前，现存的本地信仰以萨满教的形式扎根，萨满教是太阳、大地和自然力崇拜还有祖先崇拜的混合体。在三国时代，朝鲜人相信人类的最终目标是了解、服从和崇拜天帝，天帝是人类一切事务的审判官。儒家将自己的道德准则带到这里，佛教将自己的神祇带到这里。不仅作为得到高度发达的哲学，也作为成熟的宗教，佛教很快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并且开始影响和丰富朝鲜文化、艺术、音乐和科学知识的所有分支。它赋予朝鲜人以他们最缺乏的东西：安全感和希望。在最初进入这个半岛的时候，按照与在中国和日本所采取的相同方法，佛教将本地神祇纳入到佛教的万神殿当中，它们被当作佛以前的化身而受到欢呼，并有了新名字。例如，长白山的精灵白袍贞女被称为文殊师利菩萨，她住在长年不融化的积雪中。

朝鲜佛教常常是国家事务中的有力因素，它有时实际上控制着国家。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除了它在老百姓中流行和其组织中的某种军事性之外，还有它对于知识分子和文人的吸引力。佛教徒经常积极参加反抗侵略的爱国战争。这方面的重要例子，是由僧人西山（Sosan）组织的抗击日本军阀丰臣秀吉发动的入侵运动。佛教徒在战争及和平中以动员自己僧侣团体的劳动力从事

公共福利的善行来与国家合作。例如，南汉山要塞是在僧人妙湛(Pyogam)的指导下，由佛教僧众修建的。佛教越来越多地与世俗事物联系，寺院和宝塔的建造以及经典的刊印，被认为是国家抵御敌对势力的象征；佛教建筑也是为防御和安全修建的，虽然它们的首要目的总是促进宗教。

在朝鲜统一在一个王朝统治下的新罗帝国时期，朝鲜文化在各方面取得巨大进步。这一时期在庆州东南修建的石窟庵^①华丽的石窟是其中之一。这些石窟将从印度经中亚向朝鲜延伸和从中国向日本延伸的石窟寺长链连接起来。石窟庵是根据卓越的对称设计建造的，并且以耀眼的浮雕和塑像装饰。它可能建造于8世纪中期，虽然有学者给它确定的年代更早。可是，朝鲜寺院建筑的基础是在三国时期奠定的。

朝鲜佛教寺院和庙宇的地点与总的环境，同中国和日本的地点和环境极其相似。它们一般位于山冈或者高山之中，有令人产生敬畏与虔诚的、高大森严的树木环绕。寺院前面一定距离的地方，建有令人印象深刻的门径。寺院的名称有时用梵文字母刻写在正门的中楣上。金刚山34所佛教修养处当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6是榆旃寺(Yu-Chom-sa)，它以安放在翻转过来的树木根部的53尊坐着和站着的小型佛像为特色。根据古代佛教的传说，这个结构是纪念53位印度僧人创建这座寺庙；他们在许多世纪以前来到朝鲜，靠将佛像放在每棵树的根上而战胜了一群敌对的龙。

^① “石窟庵”的英文Sokkulam是对韩文的音译，不太标准，更多见的是Seokguram。此地位于一俯瞰日本海的山坡，被韩国政府编定为第24号国宝，199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译者

朝鲜人发展的另一种艺术是铜钟的铸造，铜钟是每一座佛教寺院令人印象深刻、具有艺术性的特征，在佛教仪式中具有重要作用。它们在朝鲜的形式尤其精美，并且以有人物和装饰品的浮雕作装饰。新罗的佛教艺术由许多移居国外的人带到中国和日本。例如，中国山东省的寺院，便是按照朝鲜模式建造的。

在中国或者在中国文化渗透所及的那些毗邻国家，文化是少数贵族、官僚的特权，他们小心翼翼地不让老百姓接近它。但是，佛教突破了这些障碍。儒家经典构成了朝鲜宫廷和贵族教育的基础，佛教则吸引着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并且构成大众教育的基础。的确，佛教靠有意识地从下层群众中吸收皈依者而在文化传播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佛教徒走到哪里，宗教文学就在哪里以当地的语言刊印，甚至塑像、图画和卷轴都具有了本地的解释。

中国将自己的语言和表意符号给予朝鲜。印度贡献了梵语和构成音节表即字母表的语音字母，不仅有利于本地语言的书写和刊印，而且也是儒家学说推广的辅助品。朝鲜语里称为“吏读”(*nido*)的音节表像日语的“假名”(*kana*)一样，是一些音节的汇集，而不是真正的字母。吏读赋予某些较常用的汉字以音值，虽然其中有些准确代表朝鲜语语音的梵语字母可能令人联想到有一种本地的书写方法。朝鲜字母即共同语(*unmun*)是由名叫世宗(即 *Syel-chong*, 或者 *Sye-chong*)^①的佛僧发明的，他是朝鲜历史

① 根据原文内容，这里的朝鲜字母发明者与原文第四页谈到的“谚文”(the *Hangul*)创立者，应该都是“世宗”，即朝鲜王朝第四代国王世宗李祹(1397—1450年)；他既信奉儒学，又信仰佛教；但是，在“谚文”创立过程中，他实际上只起了召集人的作用。——译者

上最有才干的学者之一。²

李氏王朝第四代国王世宗鼓励佛教经典的翻译，并被认为是亲自做了一些翻译工作。不过，翻译方面真正的努力，是由虔诚的佛教徒和该王朝的伟大统治者、第七任统治者世祖做出的。他设立佛教事务部门，并且将许多佛教经典翻译过来。

佛教从朝鲜传播到日本。日本虽然是小国，在历史上却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尽管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的限制，充满朝气和活力的日本人民仍然不仅在亚洲几乎全部屈服于西方霸权的时候保持自己的独立，而且在实现其工业和技术现代化又不失去自己传统文化特色的方面取得显著进步。这种传统与现代性独特融合的主要原因，是它愿意接受和适应外来贡献。日本证明愿意借用和吸收外国文化特征，不是文化低下的表现，而是文化有活力的证据。日本文化是神道教（Shinto）、儒家学说和佛教的混合体。奠定日本文明基础的圣德太子，将这三个体系比作日本文化之树的三个组成部分：神道教是栽种在民族传统和民族气质土壤里的根本，儒家学说是法律、教育制度和道德准则的主干和分支，佛教则是盛开的宗教感情的鲜花和精神生活的果实。日本人民可以信奉佛教、神道教或者儒家学说，或者这些教义的任何结合形式。在7世纪初期，的确存在过提倡这样一种结合的叫作心学（Shingaku）的运动。日本人尽管为自己的传统文化感到自豪，还是经常有意识地努力从其他国家获得知识。日本领导人早在7世纪就认真挑选有才干、有前途的青年学者，将他们派遣到在国外的使馆特别是在中国的使馆，责令他们带回外国知识。在历史上，可以引证的与日本这种引进知识的做法相同的寥寥无几。尽管日

本天皇有时在地位问题上与中国皇帝不一致，日本想获得中国一切有用知识的愿望还是没有减弱。³ 因为日本人渴求外国知识并且格外细心地保护它并对它加以丰富，所以日本经常被恰当地描述为东亚文化的宝库。这个特点的确使史学家们可能对亚洲文化自身的演进过程进行有价值的透视。不借助于日本的资料，亚洲音乐史、戏剧史和宗教仪式舞蹈的历史就会是不完整的。有些在其他国家已经绝迹的文化形式在日本仍然保存：例如印度 7 世纪的音乐剧。

日本本地的宗教神道教反映本地人民生活的性格，与民族传统和社会风俗习惯密切相连。⁴ 起初，它是不能言喻的宗教，不提倡固定的教义；它是一种对于一些神祇和对于自然精灵与死者神灵的杂乱崇拜，虽然有些权威人士否认神道教最初包括对祖先的崇拜。尽管可能存在祖先崇拜的精神和保护家族与家庭的愿望，还是 8 没有像现在这样作为该民族道德生活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清晰的忠诚或者孝敬的概念。早些时候的宗教与管理没有区别，这种实践使皇族能够成为国家的家长，使天皇能够获得神性。

中国思想和宗教习俗在佛教之前的日本起了某些作用，但是这些思想和习俗退化成了预测的方法。只是在日本接触了被佛教思想所修正的具有玄学背景的儒家道德之后，中国思想才对日本精神产生了影响。儒家学说在皇宫受到欢迎，后来对日本法律和教育制度产生了真正的影响，并且贡献了教学准则的系统方法。道家思想也对日本有一些影响，但是它从来都不太重要。日本思想文明的真正进展是在佛教到来之后才取得的。

佛教在艺术和科学、文学和哲学方面丰富的文化遗产与佛教

一起进来，它们唤起更加高尚的思想，激励本地的艺术和文学。佛教为形而上学的思辨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满足了日本人对无法看见之境界的向往之情。它的确给他们迄那时为止所未知的深奥的神秘主义以清楚深刻的了解，它导致详尽的精神训练方法的发展和教士制度的建立，导致对宇宙论和末世学体系的讲授。介绍到日本的佛教大乘形式，在其从印度越过中亚、中国和朝鲜的旅途中具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和习俗，但是日本能使之具有独特的日本特色。

尽管对佛教最初从朝鲜来到日本这一点通常一致，对于它到来的确切日期的记载还是不同。在一些年代属于大约 300 年的铜镜上发现有佛教的人物，但是他们的真正意义是否为当时的日本人所知还不肯定。已知最早的著名佛教徒是司马达，他于 522 年作为逃难者去日本。后来，他的家族产生了包括第一个日本尼姑和 7 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止利在内的更有名的佛教徒，止利在奈良铸造了法隆寺大像。

9 日本佛教史大致分为三个主要时期：从 6 世纪一直到 8 世纪的传入时期（叫作足助和奈良时期）；从 9 世纪一直到 14 世纪的民族化时期（平安和镰仓时期）；以及从 15 世纪一直到 20 世纪的延续时期（室町、桃山和江户时期，以及现代时期）。

根据官方记载，佛教是由于外交原因与一个来自库达罗（百济）王国的代表团一起来到日本的。代表团中有佛教僧人随行，他们献给大和民族宫廷一尊镀金的佛像，还有其他礼仪物品、经、横幅和一封颂扬教义的书信。⁵ 据记载，天皇对于他认为是“高雅的教义”和金光闪闪、绚丽多彩人物的佛像格外喜欢。这一事件

一般被接受的年代是 552 年，在儒家学说传入日本之后 150 年。宫廷内的某些军事集团和宫廷外的某些保守阶层反对佛教，但是宫廷支持那些赞同进步政策的行政官员和外交官。随着佛教传法师、艺术家和其他移民日益增多的涌入，形势很快变得有利于佛教。总是与佛教传法团相伴的医学、艺术和科学特别是书法和天文学的传入，有助于进一步突破保守派的反对。

在 585 年短期继承王位的用明天皇，是第一个信奉佛教的日本天皇。他定制了一尊药师光王佛（*Bhaishajyagura*）即药师佛的像，该像在他死后完成，后来被安放在世界著名的法隆寺，现在还可以见到。在他统治期间，日本人止利第一次退隐脱俗而成为一名佛僧。

用明天皇之子圣德太子通过各种各样的法令和法律措施，保证了佛教的持久性。他在其姑母推古天皇（573—628 年）统治期间于 593 年成为摄政，极其受人民的欢迎。⁶ 他和其他日本显贵们接受了佛教，因为他们相信它是当时哲学思想中的世界趋势。他在 594 年 2 月颁布了作为天皇摄政的第一道天皇诏谕，宣布佛教为国教，并且鼓励三宝（*Triratna*）即佛教的三项基本信条佛、法、僧的发展。它们是信仰和专一虔诚的主要目标，构成了正直生活的根本基础。

在圣德太子摄政期间（593—621 年），国家修建了第一批佛塔、神学院、医院、诊疗所和敬老院、救济所。九州的寺院建于 596 年，法隆寺的寺院建于 607 年。⁷ 后来，圣德太子亲自讲解大乘经文，特别是《妙法莲华经》、《维摩诘经》和《胜鬘天后狮子吼经》（*Srimala devi-simhanadasutra*）。后来，法隆寺成为唯识宗

(*Vijnaptimatratā*)，即瑜伽派佛教唯心论研究的重要中心。

官员们竞相向圣德太子表达他们对他建立佛教寺院的感谢。这些寺院及其艺术，是吸引人民对佛教赞美和尊敬的有效手段。壁画、镶板装饰、顶篷和作为纪念物的石柱为佛教崇拜和仪式提供了环境，这些崇拜和仪式在音乐的伴随声中，围绕着安放在寺院中部高台上的佛像举行。这样，所有艺术都是佛教崇拜的组成部分，它不仅吸引了信徒，而且也自动地、几乎令人难以察觉地释放和升华了其追随者们的审美力。日本人被这些寺院强烈吸引，到624年为止，在日本有46所寺院、816名僧人和569名尼姑。日本寺院常常被修建以向帝王和祖先表示敬意，虽然所有宗派的寺院主要起着学术中心、崇拜和发展佛教的中心的作⽤，它们也发挥了把葬礼和看守家族墓地联系在一起的作用。这样，日本人在家族制度、帝王和佛教之间创造了一种和谐。

圣德太子派遣使节去中国索取佛经，他亲自写下了至今保存完好的评注和讲解。他不是从字面上解释大乘哲学，而是根据他自己对它的真意的理解来解释它。他的努力对于日本佛教的价值，可能就如阿育王的努力对印度佛教的价值那样。他建立同中国直接的外交关系，引进行政改革，按照著名的“17条宪法”(Kempo)奠定了国家组织的基本原则。这样，他为国家统一提供了基础，用佛教的精神思想指导和激励这个国家，用艺术和科学教育其人民。

随着新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奈良(字面意思是“和平之所”)都城^①在710年的建立，佛教受到进一步的推动，佛教历史的新阶段

^① 指在710—784年作为七代天皇首都的平城京。——译者

开始了。元明天皇（701—756年）在这一发展中起着核心作用；他在统治25年之后放弃了皇位，一生中的最后七年是作为僧人度过的。的确，许多日本帝王躲避世俗权力的重压或者快乐，而过上了佛僧的苦行和宁静的生活。元明天皇的统治时期被称为天平时代，标志着宗教艺术还有政府行政发展的顶峰时期。他在全日本建立寺院庙宇作为宗教仪式、修行还有社会工作特别是医疗服务的中心。他在奈良修建给人印象极深的寺院东大寺，该寺内供奉着庄严的大日佛像（即Roshana），佛像神情安详冥思，十分端庄。这尊佛像的落成仪式在752年举行，许多印度僧人和观光者参加了这一仪式，这一事件被视为日本佛教史上最辉煌的事件。元明天皇还建造了高出地面49英尺的大铜佛像（the Daibutsu），这尊佛像被视为统一国家的象征。

794年，雄伟的新都在奈良以北几英里的平安即现今的京都建成。日本的首都1868年迁到东京之前一直在京都。佛教活动的新阶段随着首都的迁移开始，一些新的佛教建筑物在京都修建。假名字母系统的发明和广泛应用正是在平安时期（794—1191年）。可能是日本最优秀的文学作品的《源氏物语》（*The Tale of Genji*）也在11世纪的这一时期写成；在这部作品里，佛教的悲观厌世观与耽于声色的生活交织在一起。

随着佛教开始渗透到日本社会，它的追随者们开始表现出对它引进的几种多样性中的一方面或者另一方面的偏爱，但是日本佛教后来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本地思想流派。两个新宗派在9世纪期间建立：最澄所创的天台宗和空海所创的真言宗。它们的主要目标是用日本术语介绍佛教教义，训导佛僧。两个宗派都不仅强调精神的解脱，而且